

新聞事件

今年以來，處於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各項主要指標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和回落。一方面，過度倚重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正得到糾正；另一方面，在出口下滑、內銷乏力交困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嚴重不足。種種跡象顯示，支撐中國過去30年高速發展的低成本、高增長的發展模式，正在為高成本、低增長的現狀所取代。那麼，支撐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動力究竟在何方？

對話人物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先生
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人選理由

盛洪先生於1993年與幾位經濟學界同仁創辦了天則經濟所，先後致力於宏觀經濟理論和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產業經濟理論和中國產業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結構、起源和變遷的研究，文明的衝突、融合與整合問題的研究。他為普及經濟學所作出的努力與其對文化與道德問題的關注難分伯仲，字裏行間交織著理性主義的冷靜思考和關注天下未來的文化激情。

盛洪：直面低增長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先生

城市化擇路須政府轉軌

城市化蘊藏增長動力

香港商報：今年是中國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一方面，外需疲弱導致出口增速放緩、訂單下滑；另一方面，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各類固定資產投資亦在減少；與此同時，百姓收入增長有限，國內消費增長依然乏力。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多年形成的依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能否持續？中國經濟靠什麼完成既定的增長目標？

盛洪：中國進出口順差的未來趨勢就是逐年減少，因為金融危機以後，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美國需求增長正在逐步萎縮。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就是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遠遠沒有完成，城市化率才50%左右，距離80%的城市化率還有很大空間。

城市化意味著巨大的投資，因為城市需要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和住宅建設等。可以說，沒有任何產品的投入會有城市化投資這麼大。所以中國其實是有好的條件的，關鍵是現在要非常明確地看到，我們靠進出口順差、靠外需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要轉向國內市場。國內市場主要是消費，首先就是對城市的消費。轉移到這個方面來，其實我們還有著非常強勁的投資需求和增長動力。

香港商報：我們注意到，在城市化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為城市化而城市化。由於缺少產業的支撐，一些城市僅有一個空架子，淪為空

城、死城，如何避免出現這種狀況？

盛洪：現在中國的城市化有很大的缺陷，在於政府主導的城市化、為了政績而城市化，這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城市化本身就能創造財富，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產生大量的需求，自動帶來很多產業；這些產業主要不是工業，而是服務業。

如果是走以市場化為主導的城市化道路的話，上述問題是不可能存在的。現在看到的問題實際是地方政府的政績衝動，它不明白城市發展的內在機理是什麼。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因為這些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與市場的需求是部分重合的。比如說在傳統城市的附近

再建新城，是沒有問題的。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進行城市擴張，因為這些地方本身就是好地方。

鄂爾多斯的問題在於擴張得太超前，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鄂爾多斯擴張模式，也許再過很多年才能確定成功與否，因為這些地方最近幾年經濟發展很快，人口也逐漸變得稠密。

在產業發展與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認識到，產業發展更多依賴於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對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把軟硬環境做好，吸引企業家進來。只要有一個很好的制度環境，產業是不缺的。



保護「小產權」房和城中村的合法權益，可有效平抑房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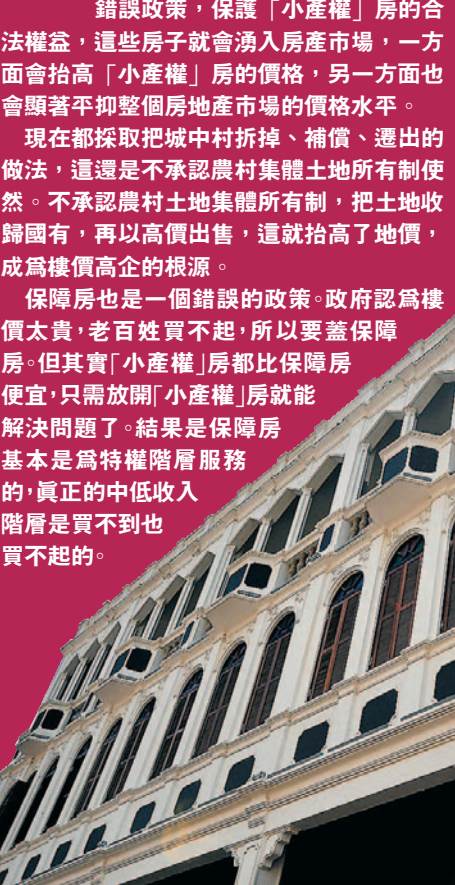
香港商報：本報記者在調研中發現，樓市調控下，各地房地產市場均出現成交量大幅下降的情況，成交價微跌。開發商資金鏈非常緊張，對房地產及相關產業造成較大衝擊。請問目前內地樓市的拐點是否到來？有關開發商向本報記者表示，目前的樓市調控政策只盯著開發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如土地招拍掛制度、中央與地方分稅制等。您如何評價現有的樓市調控政策？

盛洪：樓市調控的背景就是不合理的，樓市調控的前提是樓價太高，上漲過快。樓價上漲太快是因為一大批住房供給被政府排除在市場供給之外，就是城中村和「小產權」房，目的是為了維持國有土地部門對土地的壟斷，以高價賣地。

據國土資源部估算，2007年全國的「小產權」房共約66億平方米。如果按人均30平方米計算，能住下2.2億人，相當於當年城市人口的37%。如果考慮到「小產權」房多是低收入工人和剛畢業的大學生居住，人均面積較低，比如20平方米，則可住下3.3億人，相當於當年城市人口的56%，幾乎可以完全解決全國城市的住房問題。如果廢止針對「小產權」房的錯誤政策，保護「小產權」房的合法權益，這些房子就會湧入房產市場，一方面會抬高「小產權」房的價格，另一方面也會顯著平抑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水平。

現在都採取把城中村拆掉、補償、遷出的做法，這還是不承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不承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把土地收歸國有，再以高價出售，這就抬高了地價，成為樓價高企的根源。

保障房也是一個錯誤的政策。政府認為樓價太貴，老百姓買不起，所以要蓋保障房。但其實「小產權」房都比保障房便宜，只需放開「小產權」房就能解決問題了。結果是保障房基本是為特權階層服務的，真正的中低收入階層是買不到也買不起的。



產業發展須由市場主導 市場失靈才靠政府

香港商報：本報記者一路調研發現，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各地方政府紛紛制定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主導產業發展方向意識強烈。並且各省及主要城市間新興產業規劃多有雷同，同質化競爭明顯，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盛洪：政府制定產業規劃可能起到負面作用，很有可能由於政府對此不敏感而做出錯誤選擇，把有發展潛力的產業給屏蔽掉、淘汰掉了。比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規定必須引進世界500強企業，地方政府更喜歡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喬布斯來了，可能就被趕走了，因為他衣衫不整，身上還有異味。馬雲創立阿里巴巴前也曾到過深圳，但當時深圳卻沒人理會這個長著一副娃娃面孔、身材瘦小的杭州人。

很多有創意的大企業都是從市場中產生，從小生意做起，政府很難判斷哪些會是未來成功的企業。實際上除了市場，誰都沒有能力判斷，因此一個良好的市場制度至關重要。喬布斯不是政府扶持起來的，是風險投資在市場中進行判斷然後投資的。

香港商報：本報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廣東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江浙主張「強政府、強市場」；前者以市場為主導，政府不過多干涉，後者政府的引導和服務意識比較強，即「政府」與「市場」兩手都要抓。兩種模式孰優孰劣？您有何評價？

盛洪：政府只設在市場失靈時參與。比如市場常常缺少長遠眼光，一些超前的公共設施因此缺乏規劃，比較凌亂，這時政府要作出規劃，引導城市化進程。但這種規劃是靈

活的、有彈性的，在大框架上引導，不拘泥於設定的模型，適合發展什麼產業，最後要由市場決定。如美國華爾街當初並不是金融一條街，紐約證券交易所原來是咖啡館。還有一些大規模的超前投資，私人企業沒有這麼大實力，或者相當長時間不能獲得收益，如地鐵建設，這就需要政府來做。城市產業聚集和人口聚集也需要一定門檻，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政策來聚集產業和人氣。政府應起到輔助性作用，但切記不要去主導市場。

還有一種介於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機構，叫做非營利性非政府組織，例如行業協會或提供技術標準的產業聯盟等。有些事務不必完全由政府做，大量非營利性非政府組織可以承擔。即使是非營利性事務，由社會組織承擔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

政府宜改徵地為收稅

香港商報：中央與地方分稅制是否讓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十分依賴的一個根源？

盛洪：可以這麼講，也可以不這麼講。因為政府的財政收入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可以讓農村集體與開發商達成一個價格去賣地，政府對土地交易進行徵稅，土地增值稅稅率在30%-60%，總體上比政府直接賣地收入高多了。並且政府徵稅是天經地義的，合法合理，可避免很多負面影響。

政府直接賣地最大的問題在於，地方政府與農村集體間是不平等的市場主體，很自然會用政府的強制性權力去壓低土地價格，導致了對農村利益的侵奪。由強拆導致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民衆不滿情緒高漲。

地方債相對安全 關鍵在理順機制

香港商報：您是否認同中國地方債務存在危機的說法？對於地方債務您有何看法？

盛洪：地方債從現行制度上來說是不合理的，中國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是不可以舉債的，但是地方政府在城市發展中需要更多的錢，所以各地採取變通辦法，成立城市投資發展公司，城投公司成為地方政府一個融資平台。正是因為城投拐了一個彎，所以地方債就變得非常模糊。嚴格來講，地方債要經過當地人大批准，但通過城投，地方債就從當地人大和民衆視野中消失了，不受監督。從制度上來說，地方債要理順機制，從法律上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借債，保證透明公開，能夠被監督到，這樣其實更安全。

當下地方債總體上都與城市發展有關，而且都有一個強有力的抵押品——土地。中國正處於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土地的價值是逐漸升高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地方債相當大一部分是相對安全的，因為它背後是土地。中國地方債的問題主要是制度上的問題。當城市化完成了，土地沒了，再有地方債時，如果管理不善，不能從制度上有效監督，就可能導致地方債出問題。



政府應退出土地市場，只能就土地交易徵稅，否則無法保證公平交易。

當下最重要兩大改革： 國企改革與土地改革

香港商報：我們在溫州調研發現，當地部分人士認為溫州金融改革試點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突破，對此您怎麼看？

盛洪：政府在推進金融改革上「口惠而實不至」，顯示決策層改革的決心和執行力還不夠。

香港商報：您認為目前中國最值得期待的改革是什麼？

盛洪：現時中國最重要的兩個改革實際上就是國企改革和土地改革。國企要不斷地從

營利性領域退出；不退出就意味著國企要與民企競爭，這種競爭不可能是公平的。凡是營利性領域就應該由市場和民營企業主導；有些公共性質的領域，市場失靈的領域，可以由國企來做。政府本來是法官，若要進入市場當商人，如何公正裁決與他人的糾紛？

政府還應退出土地市場，只能就土地交易徵稅，否則無法保證公平交易。這兩個改革都是一個邏輯，就是政府不能同時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